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第一冊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

前言

這五大冊的紀念論文集，是徵集國內外許多位具有學識、經驗與事務的

目標之下，為紀念國父——而發揚光大其遺志。因為國父眼光鉅闊，氣

國父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

惟發動較遲，延請未週。諸公思慮，隨時見教，俾再版時得以更正，甚所企盼！

不覺翼翼小心，猶聞遺教對上之錯謬，幸而隨時見教，俾再版時得以更正，甚所企盼！

本會誠懇的致謝於各位著者，更致謝於五位專責小組的委員和兩位富有編纂經驗的編輯，他

們懷重其事的精神和方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

籌備委員會

國父百年誕辰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台北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第一冊
(全五冊)

主編者：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

出版者：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十三號

印刷者：上海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臨沂街五號

版權所有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前言

這五大冊的紀念論文集，是徵集國內外許多位具有學識、經驗與事功的專家學者們，在同一目標之下——為紀念國父——而發揚光大其遺志。因為國父眼光的高遠，氣度的恢宏，與當今世變的緊迫，所以我們放寬角度，以此請教於海內外的賢達。匯百川而注東海，正當其時。

惟發動較遲，延請未週。諸公構思集稿，已費時間，而拜讀大著之同人，對若干皇皇巨帙，甚覺翼翼小心，猶間遺校對上之錯誤，如他日能隨時見教，俾再版時得以更正，甚所企盼！

本會誠懇的致謝於各位著者，更致謝於五位專業小組的委員和兩位富有編纂經驗的編輯，他們慎重其事的精神和方式，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忠誠。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第一冊 目錄

(一)

解決亞洲問題的唯一途徑·····	張 羣·····	一
孫中山先生與信仰自由·····	于 斌·····	一六
國父實業計劃的卓見·····	馬超俊·····	二四
西南護法政府內變及陳炯明廣州叛變救平紀要·····	陳肇英·····	二七
我對國父的體認·····	萬耀煌·····	三二
得道多助，復國必成·····	孫連仲·····	三九
國父與廣西·····	白崇禧·····	四二
溫故知新·····	周至柔·····	四七
於兩間留正氣，為萬世開太平·····	嚴家淦·····	七二
國父倡導女權的主張·····	錢劍秋·····	七七
「行易知難」與「革命實踐」·····	陳大慶·····	八四
國父的音容與感召·····	羅 奇·····	八七
毋忘「航空救國」遺訓·····	徐煥昇·····	八八
國父的偉大·····	陳嘉尚·····	八九
從國父遺教體認軍人楷模·····	黎玉璽·····	九〇
慶祝國父百年誕辰·····	賴名湯·····	一〇〇

國父與華僑.....黃珍吾.....一〇三

恭述國父之大聖、大哲、大傑思想.....李彌.....一一〇

國父的偉大.....方治.....一一一

對三民主義世紀應有之努力.....黃仁俊.....一一三

我對總理「知難行易」學說的體驗.....汪少庭.....一一五

砂勝越華人社會中的孫中山先生.....李敦嶠.....一一七

國父遺教與邊疆政策.....郭寄嶠.....一一九

對國父有關邊疆民族遺教之體認.....李永新.....一二一

申述國父思想的淵源.....鄧傳楷.....一二八

三民主義之史的佐證.....沈之岳.....一三七

國父論革命的精神因素.....翁鈐.....一四二

臺灣與國民革命的關係.....柯台山.....一五一

以收復大陸決心和行動來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延國符.....一七二

(一)

國父思想及其對今後世界之影響.....陳立夫.....一七五

國父遺教是正導二十世紀思想的主流.....薛光前.....一八〇

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羅香林.....一八九

國父在香港.....吳壽頤.....二一七

從三民主義批判共產主義的理論.....何浩若.....二三四

大學為孟子學說考·····	勞 榘·····	二七五
闡論國父思想的理論體系·····	楊幼炯·····	二八一
論英美衡平法之原則與救濟方法·····	何孝元·····	三一—
國父繼承我國正統思想之研究·····	任覺五·····	三四五
國父思想的發展·····	錢用和·····	三五八
三民主義是自由世界反共的思想標幟·····	邱有珍·····	三七—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程發軔·····	四〇二
三民主義的發展·····	周開慶·····	四三五
國父百年誕辰敬述正太鐵路同志革命史實·····	段劍岷·····	四五八
民生哲學與三民主義之研究·····	趙自齊·····	四六九
百年來的刑事思想與三民主義·····	周冶平·····	四八四
國父思想概觀·····	黃鎮荃·····	五〇〇
三民主義與新世界建設·····	王乃健·····	五二六
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丁 迪·····	五五六
國父的科學思想·····	陶 唐·····	五七二
國父的民族主義與洪門·····	睦雲章·····	六〇六
百年來中國社會變遷大勢·····	祝 毓·····	六二九
北雙調新水令散套（詠三十三年落花夢）·····	尉素秋·····	六六二
恭論國父之偉大——法古今完人·····	雷為霖·····	六六七
國父與中國道統·····	晁介嶺·····	六七四

我對三民主義的認識……

戴問梅……六九二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第一冊

(一)

解決亞洲問題的唯一途徑

張 羣

——共同努力實現國父的大亞洲主義——

在全世界視線集中亞洲，而亞洲大局又動盪不安日益惡化的今日，來紀念國父的百歲誕辰，我們不能不衷心服膺國父大亞洲主義識見的高遠和主張的正確，而慨歎於亞洲國家的因循坐誤，甚致錯了方向，走着相反的道路。但是，大亞洲主義雖然到現在還沒有能够實現，而事勢所趨，其需要更見迫切，真是歷久彌新，依然是今天解決亞洲問題的唯一途徑。這至少半個世紀的蹉跎，固然不能說是那一個國家的責任，但中、日、美三國有其最重要的關係，那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藉此機會，痛切檢討，加倍努力，以促大亞洲主義的實現。

國父大亞洲主義的演講，雖發表於民國十三年，但實際上是從事革命以來的一貫主張。民國二年在東京，國父就對桂太郎說：「就大亞洲主義之精神言，實以真正平等友善為原則」，已經提出了「大亞洲主義」這個名稱。民六著「中國存亡問題」，雖然未提「大亞洲主義」之名，却具體的說出實現大亞洲主義我國所應努力的方向，國父說：「中國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於美日之外，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為兩國謀百年之安，必不可於其間稍設芥蒂；次之則為美國，美國之地雖與我隔，而以其地勢，當然不侵我而友我，況兩國皆民國，義尤可以相扶。中國而無發展之望則已，苟有其機會，必當借資於美國與日本，無論人材資本材料，皆當求之此兩友邦，而日本以同種同文之故，其能助我開發之力尤多，必使兩國能相調和，中國始蒙其福，兩國亦賴其安，即世界之文化亦將因以大昌，中國於日本，以種族論為兄弟

之國，於美國，以政治論爲師弟之邦，故中國實有調和日美之地位，且有其義務者也」。又說：「夫中國與日本，以亞洲主義開發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國亦以其門羅主義，統合太平洋以東之勢力，各遂其生長，百歲無衝突之虞，而於將來，更可以此三國之協力，銷兵解仇，謀世界永久之和平，不特中國蒙其福也」。可見國父認爲中、日、美三國合作，是安定亞洲、繁榮亞洲、進而謀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並且希望以中日合作爲亞洲東部各民族聯絡的原動力。

六十餘年來中日關係的離合演變，自然是給予亞洲大局以最大的影響。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力漸充，國父以爲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又以爲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的一天，這都是站在亞洲整個立場對日本寄以殷切的希望，不僅是爲了中國。原來在日俄戰爭的時候，中國是親日而仇俄的，那時中國青年學子，對於日本的進步，也很嚮往，留日學生，常在萬人上下，國父所創導的中國同盟會，也在東京成立，並且因爲地理人事的關係，——離中國近，華僑又多，國父便以日本爲革命的主要策動地，日本有志之士，同情中國革命的也很多。要是從這時起中日兩國就真誠的合作，那經過這半個世紀多的努力，國父大亞洲主義的理想，早就可以實現，今天的亞洲，也不會像這樣的動亂與黑暗了。不料日本一躍而爲一等強國以後，不但不與中國合作，反而與俄國妥協，一方面受了德國尼采哲學和鐵血主義的侵潤，沉醉於軍國主義，滋長了侵略的野心，以侵略中國爲目標，與俄國先後訂立四次密約，到了民國四年，公然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於是激起中國人民重大的反感，由親日一變而爲仇日。而日本軍閥爲欲達成其侵略中國的目的，始終以分化中國內部割裂中國土地爲其一貫的方針。國父及其繼承者蔣總統雖然一本大亞洲主義的原則，對日本開誠相見，力持忍讓，但終於不能喚醒日本軍閥的迷夢。那時日本軍閥的橫暴驕慢，回想起來，令人髮指。戴季陶先生曾言，彼於民國十六年，奉命赴日重申中日親善之旨，日本軍部於宴別時，某陸軍大臣竟致傲慢之乾杯詞曰：「敬賀戴先生，革命黨已得南京，昔年君等僅據有廣東，此一隅之地，不足以言天下，南京則是國際舞台，一國之建立，須具實力，非恃空論，日本之有今日，乃武力爭戰勝利而來，諸君如何？請幹罷！」軍閥驕矜之氣，已覺不可響邇。就以我所親身經歷的幾段事實來說：民國七年，段祺瑞派吳光新赴日，活動參戰借款，是時適上海新聞記者亦組團訪問日本，我以代表上海民國日報及中華新報資格，前往參加，表面上爲參觀日本新聞事業，事實上另有政治使命，即爲阻止借款。當時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田中義一中將，即爲主張借款最力之人，其目的

無非爲扶植軍閥。我因訪田中力爭，辯論極爲激烈，歸國後曾撰「中日親善之疑雲」一文，在中華新報發表，表示對日本之不滿。十六年十一月，田中已任首相，我隨蔣總統同往訪談，談到中國大局，他認爲「革命軍應先安定長江以南，不必急急於北伐，關於北方張閻馮之爭，不妨袖手旁觀，而日本在國際關係許可以及不犧牲日本權利與其他之限度內，不惜予以援助」，其不願見中國的統一，與覬覦中國北方權益的心理，昭然若揭。十七年繼續北伐，軍隊必須經過濟南，濟南日僑頗多，我政府爲冀避免衝突，希望日軍暫時撤往青島，所需費用，由我方負擔。而日軍則堅持現地保護，並且藉口增兵護僑，阻我由濟北上，情勢緊張，政府因派我赴日疏解。不意即在我抵東京之日，發生「五三」慘案，我急以電話與日本參謀部第二部長松井石根，亞細亞局長有田八郎聯絡，並於晚晤商解決辦法。翌日往訪田中義一首相，懇切陳述我方意願，田中表示日本增兵，旨在護僑，並無影響北伐之意，允派松井部長前赴濟南，晤師團長福田彥助傳達意旨，我亦即遣返。時我總司令部設在徐州，福田堅持必須在日軍之前，將會抵抗日軍之方、陳、賀三軍團全體解除武裝，並將肇事軍官處以嚴刑，迫我爲城下之盟，態度至爲橫蠻。我因急電田中，促松井來華，並電令福田靜候和平解決。旋得松井電，約往濟南或青島會晤，經往復電商結果，與松井會於濟南以南之黨家莊，與松井同行者有福田之參謀長及日本駐濟南總領事西田等人，我則單身與會，幾經談判，費盡唇舌，才把形勢緩和下來，將交涉移歸外交途徑辦理。當時我政府的態度，就如我致田中的電報中所說：「因鑒於兩國根本之利害，並遵中山先生生平之主張，極不願事態擴大，使國民受刺激太深，影響及於東亞前途」。由於我們這樣的苦心因應，方能排除萬難，底定平津，完成統一的大業。但是日本政府，並不改變其「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的政策，在華日本軍人，依然不改其驕橫強暴的態度，甚且變本加厲，於是有民國二十年藉口萬寶山事件釀成「九一八」之變，這是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以後對我國人民情感上又一大刺激。當時我國雖向國際聯盟申訴，請求主張公道，但國聯軟弱無能，毫無實際效果，日軍在東北的暴行，日見擴大。二十一年「一二八」，復在上海挑釁，發生淞滬戰爭，嗣後雙方雖遵國聯決議停戰，而日本復乘國際目光集注淞滬之際，在東北製造傀儡偽「滿洲國」，一面擴大侵略範圍到熱河及長城各口，迫近平郊，華北形勢，嚴重已達極點，直到訂立塘沽停戰協定，才算暫告段落。自然，日本軍人在華雖不斷作如此激烈瘋狂的舉動，而他們國內的意見，也並不完全一致，所以，「改變對華政策」，「恢復中日親善關係」的呼聲，也常隱約可聞，並且爲了緩和國際間對日日益不利的空氣，二十二年九月，以標榜國際主

義的廣田，出任外務大臣，宣稱不侵略、不威脅，表示要努力來改善中日關係。而在我國方面，一本國父遺教，果使兩國關係有法改善，能够真正合作提攜，來挽救亞洲的厄運，自不惜予以同情。二十三年秋，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氏自瑞士歸國，翌年二月，王氏返任過日，以私人資格面晤廣田，傳達我政府善鄰之意旨，希望於日本的兩大原則：

(1) 中日兩國完全立於平等之地位，互相尊重在國際間之完全獨立，故日本應首先取消對華一切不平條約，尤應取消在華領判權。

(2) 中日兩國應互相維持真正之友誼，凡一切非友誼行爲，如破壞統一治安，及妨礙人民衛生等，皆不得施之於對方。又中日外交方式，應歸正軌，絕不用外交和平手段以外之壓迫及暴力。

廣田對於此兩大原則，表示同意，但請中國暫時勿談滿洲問題。此後日本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四省，雖然迭次開會，商討對華方策，迄未能得到統一的具體方案，而廣田復提出其所謂「三原則」。二十四年十一月，蔣委員長在本黨五全大會闡明我國外交方針及對日態度，宣示「國家與國家間，決無百年不解之仇」，「以不侵略主權爲限度，謀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爲原則，謀友邦之經濟合作」，「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爲和平最大之努力」。蔣委員長旋即出任行政院長，並以本人担任外交部長，深見其謀求解決中日問題的誠意與決心。本人對於外交雖非素習，但是爲求實現中日親善以安定亞洲的夙願，抱了滿腔的熱忱，期作最善的努力。我的任務，是要經由外交正當途徑。全面調整中日關係，就任後曾經明白的表示：

「中日兩國處於今日之情勢，若不謀國交之徹底調整，不獨爲兩國本身之不利，即東亞和平，亦將受其影響。故本人受任以來即具有充分決心，主張由外交途徑，調整中日關係。就中國方面言，任何問題，苟以增進兩國福利鞏固東亞和平爲目的者，均在設法調整之列；任何方法，苟以互惠平等互尊主權爲基礎者，均得認爲調整之良策。總之，所謂調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時言非爲目前之苟安，而爲雙方萬世子孫謀永久之共同生存。中日間縱不幸而有嫌怨，則世上無百年不解之仇，其間自有恢復和好之道，而解仇修好，其責任在於今日雙方之具有眼光與富有毅力之實際政治家，深望雙方負責當局，就大處遠處着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樹立善意的諒解，祛除敵意的禍根，尤須相互明瞭其立場與困難，迅速經由正當

途徑，開誠協議」。

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我與日本有田大使連續作四次懇切的談話，那時有田將返國轉任外相，我爲使其了解中日關係之癥結，坦白說明三點：

「(1)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人民，初無夙怨，其仇日心理，完全出自被動，最近數年日方連續用武力或威力來壓迫中國，中國人民之對日心理，不獨不能轉好，且愈趨愈劣，故在此時，雙方皆須表示誠意，如去春及今春，廣田外相在議會所公表之不侵略不威脅政策，務須實行，以釋中國人民之疑慮，此事對中日交涉前途，東亞大局，關係甚大，務請特別注意。

(2)過去中日幾年來之外交，失去常軌，兩國遇一問題，如華北問題等，每每不循正常之軌道，僅求局部之解決，以彌縫於一時，殊不知此種辦法，於法既屬不合，於理亦說不通，故其結果，並無確定性，徒貽事後之糾紛，若長此以往，則雙方外交，無從進行。即如閣下所謂使華北不受政局之影響一點，以余所見，則以後任何問題，皆須經外交途徑，由中央解決，方有圓滿之結果。

(3)我人當知中日糾紛，起因於「九一八」東北事變，故中國人民，在調整中日關係時，皆希望先將東北問題，謀一適當之解決，此方爲根本之辦法。倘日本能同意此一點，則日本對中國方面之要望，亦可以盡量提出，即對外謀軍事之合作，對內謀經濟之提攜，均有希望，否則，中國之要望，日方不能接受，而日方之要望，中國亦不能容納，則中日問題，任我人如何努力，亦終不能解決，此中利害得失，貴方似宜熟思」。

然有田始終挾持其扶植滿洲國及華北特殊化之成見，並言明日本軍人素認中國中央沒有辦法，故對華北問題，總希望由地方當局負責解決。這樣談來談去，談了四次，雙方距離，總是無法接近，我歸納起來，歧見所在，最大的有五點：

(1)中國方面，認爲滿洲問題，必須得一適當之解決辦法，否則，中日問題，即不能根本解決；但日方認爲此刻不能再談滿洲問題。

(2)中國方面認爲滿洲問題如一時不能解決，亦可先談其次之問題，最低限度須解決華北問題。但欲解決華北問題，須先由日本取消中日邦交之障礙物，如「塘沽協定」，「何梅談話」，以及軍人間之一切約束；而日方則認爲必須先由中國承

認滿洲國，而後方能談到取消塘沽協定。

(3) 中國方面認為日方應尊重中國主權之完整，華北問題，當依外交途徑，由中央談判解決，不能由地方辦理；日方則認為華北問題，一定先要確定華北政權之獨立，由華北地方解決。

(4) 日本方面亟欲與中國共同防共及訂立防共協定；而中國方面則以中國已在剿共，必須滿洲國及華北問題解決，始可與日商訂防共協定。

(5) 中國方面認為日本須先容納中國方面之要望，而後中國方可接受日方之談判；日方則認為須由中國方面先行表示接受日方之要求，表示親善之誠意，而後日本方可考慮中國之要望。

有田返日任外務大臣後，二十五年四月，川越茂繼任駐華大使，事實上上面所說各種歧見，固然依然存在，而日本軍人又悍然強化華北駐軍，抽調精銳部隊，改作戰時編制，配備新式武器，分駐平津、平綏、北寧沿線各要點，形勢更趨緊張，在軍人掩護下，走私愈見猖獗，加以成都、北海毆斃日僑，以及漢口日警、上海日水兵被狙殺事件，先後發生，日方更一再以阻止人民「反日」「排日」為言，從是年九月起兩個多月之中，我與川越有七次長時間的會談，我一本蔣院長凡無礙於國家自由與平等者，皆當共商解決，苟有礙於國家之自由與平等者，決不稍事遷就的宗旨，爭所必爭，論所當論，以嚴正的態度，作反覆的商討。關於阻止人民反日排日一點，我更不憚坦白而徹底的指明：

(1) 消極的去除惡感：凡百行動莫不出於情感，行動縱可暫時的勉強制止，而情感發於自然，出自環境，非政府制裁力量所可變更。中國人民果有反日者，推其心理，何嘗因日本人而懷恨日本人，實因頻年所受之痛苦，均由於日方之行動所致，因權利之喪失而感悲憤，因悲憤而激發於行動，若日方自此與中國人民真正修好，立刻停止一切策動，則世間無百年不解之仇，經過相當時日，中國人民之對日心理，自可漸復常態。否則，如日方繼續在華策動，徒使國人日感不安，其反感更加深刻，政府雖日發一令，恐亦不能改變人民之心理。故日本在消極方面，應明白廢棄武力干涉與高壓態度，則人民感情可望恢復，兩國邦交，庶可實際調整。

(2) 積極的樹立新國交：我政府雖願盡其所能，引導人民對日觀感，但此猶非根本辦法，根本辦法，必須兩國間從速樹立平

等新國交，一掃過去之仇恨與疑心，而使觀感爲之一新。因此，日本不但須停止在華種種策動，且在積極方面，必須表示尊重中國主權與行政統一之誠意，必如此始可永絕糾紛，而真正增進兩國之邦交。

(3) 認識奸人陰謀：無論何國，處於患難之時，其人民中必有利用時機加害於政府之徒，中國不幸有正在剿滅中之共產黨徒及反政府之陰謀黨徒，此輩奸人，隨地皆有。若輩明知殺一日人，政府必處於極不利之地位，遂設計造成不幸事件，以陷害政府，甚至挑起中日戰爭，亦所不惜。故日方如遇一日人被害事件，即向我嚴厲交涉，或竟小題大做，武力示威。則適中此輩陰謀者之奸計，而兩國人民間之感情循環刺激，殺害案愈多，而日方愈壓迫，日方愈壓迫，而殺害案愈多，國際政治，最怕遇到此種惡性循環，深望日本朝野人士，認識此種情形，勿墮奸人之計。

爲了東亞大局，我更剴切的告訴川越：「我人彼此爲東亞大局計，皆有遠大抱負，但彼此立場各有不同，換言之，兩國外交官各爲其國家，意見未免有不同之點，希望彼此努力折衝，以成有終之美。我人承認日本政府及廣田首相與有田外相對調整中日邦交，皆具熱心，故甚願日政府努力使中日邦交調整可以成功，同時我人亦希望日政府認識現在中國政府爲調整中日邦交最有誠意最有力量之政府，此實雙方難逢之機會，如此時不能達到調整之目的，則前途將更感困難」。但是川越的答覆，也很坦白，他說：「現在日本政府的力量，比不到中國政府，因中國政府在蔣院長指導之下，能主持一切，而日本政府目前雖無更動趨向，但明年度之預算問題、行政機構改革問題、外交問題，處處有使政府爲難者，而外交問題，尤爲重要」。言外之意，顯示其內心也未嘗不自覺痛苦，因爲自「二二六」事變以後，太阿倒持，日本政府及外交當局，沒有人敢於攪軍人之鋒，稍作主張，軍人在華北自由行動，爲所欲爲，每假突發事件，爲要脅的口實，所以雙方談商，除了成都、北海兩案，雖在極端緊張空氣之下，仍得於國際普通條款之下解決外，其他調整關係的根本之圖，始終不能獲得結論。至二十五年十一月間，綏遠局勢突然擴大，交涉就無形停頓，兩國全面調整關係的構想，成爲泡影，我也於二十六年三月辭去外交部長。我之在此不憚煩的把這幾段故事詳細申述者，一則因爲我親身經歷之事，印象最爲深刻，日方對手盛氣凌人之態，歷歷在目，不特交涉有隨時破裂之虞，實有非常人所能忍受者，惟當時我國正在全力剿匪，又值兩廣異動之際，必先安內而後始足以言攘外，故對日不得不力持堅忍，蔣院長主持大計，負國家安危之重，苦心孤詣，至電余囑在最困難時，可閱讀行營印行的「鄭子產傳」，以持志養氣。二則誠如我對川越所說，此時

中國的政府，是對調整中日邦交最有誠意最有力量的政府，深覺這個機會在形格勢禁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錯過，固然咎不在我，但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失敗，也不僅是中日兩國的損失，而實在是亞洲歷史上的一個大劫運，至堪痛心！「上帝要毀滅那些人，就要他們發瘋」，蔣總統雖然婆心苦口，於最後關頭猶發表「敵乎？友乎？」的長文，以促其反省，而日本軍人悍然不顧，一意孤行，終於暴發「七七」蘆溝橋之變，造成了綿亘八年的長期戰爭。

戰爭結束，爲害亞洲的軍國主義固然是摧毀了，却種下了共產主義的大禍根，不但爲害整個亞洲，並且進一步的要以亞洲爲資本，企圖征服整個世界。「光明來自東方」，亞洲在古代文明中自有其光輝的歷史。但是近代以來，教育不發達，科學落人之後，而人口衆多，缺乏政治認識，土地遼闊，資源還未開發，以致在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國家相互競爭侵略壓迫之下，動亂不安；大戰以後，更成爲共產主義的溫床，其關係於世界大局的安危，非常的重大。我三十七年九月赴日考察時，曾經和麥克阿瑟將軍有過一段談話。我說：「共產勢力在全亞洲之擴張，此乃全亞洲之問題，非中國一國可謀解決，以東北爲例，該處有中共、韓共、蒙共與蘇共聯合在一起，在蘇共國際指揮之下，組織亞洲聯共，而以海參威爲策動全亞赤化之中心，此種勢力之擴張，將使全亞洲陷於混亂」。麥帥謂：「今後一千年，將是亞洲世紀，世界最大資源在亞洲，幾乎全未開發，人口逾十億，佔世界全人口之過半數，世界上生活程度最低者亦在亞洲，如何使全世界生活程度之高低漸趨一致，低者提高，高者降低，實爲一極大問題，余願復述斯語，今後一千年內之工作目標，即是逐漸提高亞洲人民之生活程度，根本言之，亞洲人必須自己開發自己之資源，自己製造自己之商品，以力求自給自足，亞洲必須自成一單位，通力合作，只有『統一』，方能引導進入適當之地位，所謂『統一』，即係有一亞洲人民之經濟圈，其主要目的不僅是共求生存，且係同謀發展」。他這幾句話，固然認識了亞洲今後的重要性，也不啻爲國父大亞洲主義作一註釋，他說的雖然重在經濟，而亞洲國家爲了抵抗共產主義，其在政治上、軍事上必須自成一單位，通力合作，自更不必說了。四十一年九月，我訪問日本，發表「中日關係與美國」一文，具體的提出「集體安全」與「區域經濟」的主張，其中有兩段說：

（1）從太平洋的軍略形勢來檢討，自北緯十六度的白令海起，經千島羣島至日本北海道及日本全境，復經琉球羣島而至台灣，再由此經菲律賓而至婆羅洲，過印尼而達澳大利亞，直至南緯四十度的新西蘭，在此一道漫長的弧線上，惟有日本與

台灣最鄰近赤色的蘇俄與中國大陸，且首當其衝。如其蘇俄將日本與台灣囊括以去，則太平洋上第一道反共防線已被中間突破，首尾兩端便不能相顧，失去作用。反之，如日本與台灣能够保持，第一道防線即完整聯貫，則北自太平洋的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羣島起，中經小笠原羣島、琉璜羣島、關島、加羅林羣島，南至所羅門羣島及斐濟羣島，直達於南緯二十度之東加羣島的第二道防線，便可備而不用。第二道防線依恃第一道防線如長城，第一道防線依恃日本與台灣如長城，此為戰略基地上必然的形勢。故就太平洋反共防線看，日本與中國實居最衝要的地位，日本與中國必須發揮所有的力量，抱定最大的決心，用盡一切可能的手段，來保持這兩個軍略重點。要保持這兩個軍略重點，就必須通力合作，使他不是兩個分散的點，而是一道聯貫的線，這在本身意義上是自救，在國際意義上是作為太平洋橫流中兩個犄角的柱石，惟有如此，始能配合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防禦措施，使蘇俄侵略世界的政策，首先在太平洋上受到遏制。

(2) 戰爭的主要力量，不在武器而在民族的動員力，亞洲十億以上熱烈反共的民族力量，尚在歐洲之上，如若美國使用其對歐洲同等的援助於亞洲，則亞洲的反共力量或更強於歐洲，日本雖在戰敗之餘，國力未充，然論其民族之優秀，工業基礎的深厚，以及國民精神之旺盛，種種條件，都能够確保其獨立與自由，不受赤色國際侵略所征服奴役，以日本的國力，加以美國的扶持，與自由中國的力量攜手合作，樹立先聲，自可以使亞洲各國家的反共氣勢激揚起來，相互團結，與美國在亞洲的反共措施協力，共同排除亞洲赤禍。

我們對於亞洲的認識是如此，但共產黨對亞洲的重視，絕不在我們之下，列寧一九一八年發表的「不要忘記東方」一文中，就曾說過：「亞洲是帝國主義最可靠而確實的後方，其無限資源與人力，是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蘇聯如不擇得亞洲，蘇聯共產黨就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帝國主義如不除掉亞洲，就不會完全崩潰，蘇聯共產黨必須將亞洲從帝國主義最確實而可靠的後方，和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轉變為蘇聯最確實而可靠和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必須將蘇聯被包圍的形勢，轉變為帝國主義被包圍的形勢」。所以，二次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史達林眼明手快的瞻徹羅斯福、邱吉爾，攫奪我東北的權利，從而卵翼中共匪幫，始則擁兵割據，擾亂治安，尋至全面叛亂，竊踞整個大陸，而野心一天比一天的大起來，因之與蘇俄發生領導權之爭，高唱既反美又反蘇，既反資本主義又反修正主義的濫調，目的所在無非想獨霸亞洲。反美，第一步是想把美國勢力驅出亞洲；反蘇，